

全球史視域下的《中華大帝國史》： 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重塑他者的晚明烏托邦

高博 *

摘 要 五個世紀以來，《中華大帝國史》一直在國際學術界有着重要的文化影響。其作者門多薩在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語語境中塑造了強大和富庶的他者想像之中國形象，並多次指出中國的諸多經驗值得歐洲效仿。多年來，海內外相關學者也注意到這部讀本，但普遍忽視了從原著善典直抵門多薩的他者想像和認知作者的書寫立場。此外，現下研究大多從單向度的批評視角出發，把他者的中國想像視為彼時歐洲集體欲望的一種無意識投射。這種批評視域局限在歷時性平行語境之中，割裂了想像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自律性互動。因此，本文以現下研究中的問題為邏輯基點，選用門多薩本人認可的最終修訂本——“1586馬德里西班牙語修訂本”《中華大帝國史》為研究底本，在十六世紀的資本全球化初始進程中，重新解讀中西方交際語境對門多薩晚明想像的建構性。

關鍵詞 《中華大帝國史》；西方的中國形象；門多薩；器物想像；資本全球化

一、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晚明想像： 《中華大帝國史》研究中的遺留問題

毫無疑問，五個世紀以來，《中華大帝國史》一直在國際學術界有着重要的文化影響，這部讀本於1585年由西班牙政治家、學者和傳教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以西班牙語編纂完成，同年在羅馬推出了第一版刊本，以下簡稱為“1585羅馬西班牙語首版”。此版的西班牙語完整書名是“*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sabidas as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e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s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¹作

者和書名分別簡稱為“門多薩”和“中華大帝國史”。需指出的是，這部讀本的漢譯書名可追溯至1998年何高濟翻譯的首部中譯本《中華大帝國史》。該中譯本的底本是1940年在北京刊印的英文影印本 *The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China*,²《中華大帝國史》這一簡化漢語命名就是由此英文影印本翻譯而來的。筆者把“1585羅馬西班牙語首版”的完整書名翻譯成中文，即“中華大帝國奇聞要事、禮儀和習俗——根據中國典籍和到訪中國的教士及其他人士的記述編撰”，這才是該讀本的原始書名。從讀本的命名上，我們解讀到了一條重要信息：門多薩從未造訪過中國，《中華大帝國史》實際上是作者根據相關的中國典籍和歐洲傳教士對中國的記述編纂而成的一部中國文獻報導。

儘管門多薩終其一生也未能如願踏上中國的土地，但這並不妨礙該讀本一經出版就立即在歐洲引起巨大轟動，特別是相較於其後的

* 高博，西班牙語語言文學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意語系助理教授（副高）、研究員。研究方向：中國文學與西班牙文學比較研究、比較文化、翻譯研究。



圖 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1585 羅馬西班牙語首版”《中華大帝國史》首頁（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75292n>。）

漢學家基於在中國的親身經歷而撰寫的見聞錄，門多薩之書對於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的文化輻射力更勝一籌。從 1585 年在羅馬首版至十六世紀末的短短十餘年間，門多薩之書就先後被譯成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德文、葡萄牙文及荷蘭文等 7 種文字，在歐洲各國共出版印刷了 46 版。³ 相比之下，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編著的《利瑪竇中國札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 ab Societate Jesu*），自 1615 年初版至 1625 年的 10 年間再版了 11 次；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的《韃靼戰記》（*De Bello Tartario Historia*）由 1654 年問世至 1674 年的 20 年間，只再版了 21 次。⁴ 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美國歷史學家之一的拉赫（Donald Frederick Lach）曾對這部文

獻的影響力給予較高的評價：

門多薩之書的權威如此之大，以至於其為十八世紀之前的所有歐洲人撰寫關於中國的著作提供了參考基點和進行對比之依據。⁵

思考至此，筆者不禁發問：門多薩作為一個從未親歷中國的歐洲教士究竟進行了怎樣的中國想像？他的《中華大帝國史》又何以超越前人漢學家的中國書寫，乃至成為之後兩個世紀以來歐洲知識分子認識中國的重要管道和書寫中國的參照範本？為此，本文旨在以歷時性語境對文本的建構性為邏輯出發點，解讀門多薩之他者中國想像的社會生成機制。

筆者也注意到，海內外學人也關注到這一議題。如拉赫在其巨著《歐洲形成中的亞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中就曾指出，門多薩並未完全尊重史實，而是對一些殘缺的史實進行主觀臆想加工，並把大明王朝塑造成一個完美的異域烏托邦形象。⁶ 此外，拉赫還對這部讀本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歐洲引起轟動的原因進行了解讀。他指出，一方面，該讀本是在羅馬教皇的贊助和庇護下出版的，這就增加了讀本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中華大帝國史》迎合了十六世紀歐洲的時代需求，回應了彼時歐洲對中國的集體渴望，即解答了中國到底是個怎樣的國家的問題。⁷ 對於上述觀點，筆者不禁存疑。門多薩從未造訪過中國，他的報導並非是基於親歷晚明中國書寫而成，而是對前人史料的一種匯編和改寫。顯然，經由文化調適形塑而成的中國形象飽含了某種“他性”，並不是一種紀實性報導。在筆者看來，這種“他性”也正是解讀門多薩之晚明烏托邦想像的關鍵。然而，拉赫沒有解釋清楚的是，門多薩書寫中的“他性”被彼時彼地的歐洲知識分子合法化看視的過程。

漢語學人也對這部讀本進行了解讀，如廈門大學的周寧教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對西方視角下的中國形象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其

文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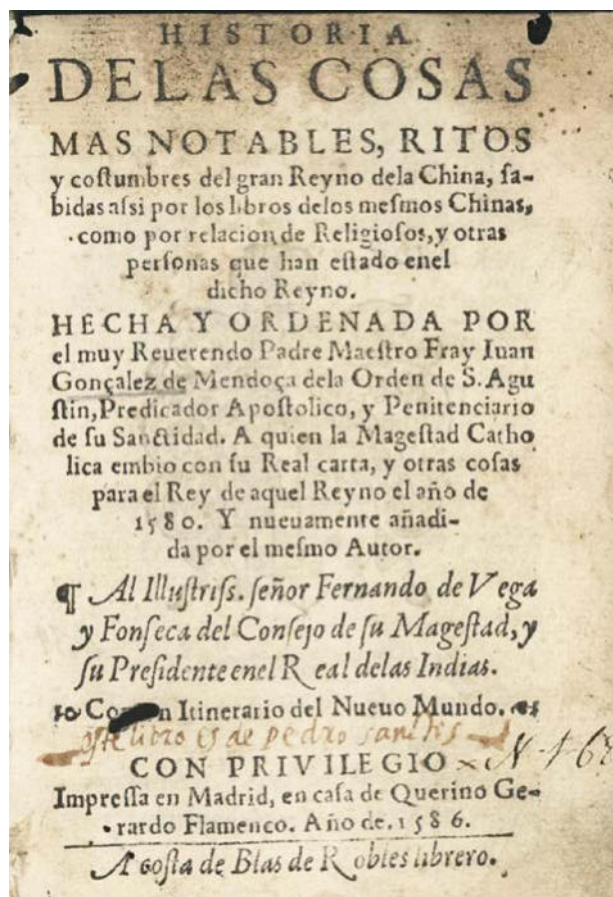


圖2. 葡萄牙國家圖書館藏“1586馬德里西班牙語修訂本”《中華大帝國史》首頁（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Portugal <purl.pt/26215>）

中，他也關注到門多薩之書的重要學術價值。周寧在異國形象類型學的框架下，把門多薩塑造的他者之中國形象歸入了“烏托邦”式的異國形象之中。他在福柯的話語與權力以及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批評框架下，對這種烏托邦式的中國形象在歐洲被他者看視的過程進行了解讀。他的核心觀點是，十六世紀的西方需要從東方他者中尋找可以利用的價值，以實現自我超越與自我新身份的構建與認同。因此，西方世界把中國視為東方楷模，從而構建出作為東方烏托邦的明代中國形象。⁸簡言之，周寧認為門多薩塑造的中國形象背後的生成機制是“西方人把中國和西方視為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格局設置了現代性的基本困境”。⁹我們不妨

細讀一段周寧的觀點：

無論是烏托邦還是意識形態類型的中國形象，這兩種話語機制的文化功能都在於構建一個與西方現實差異甚至相反的他者。十六世紀的歐洲仍處於文藝復興時期，其需要從東方他者中尋找可以利用的價值來實現自我超越，因此把中國視為東方楷模，並把這一階段的西方中國形象歸入“烏托邦”式的異國形象。而進入十八世紀的啟蒙階段，西方完成了現代文化的自我和認同，中國作為二元對立的他者失去了西方中心主義世界秩序構建和自我認同過程中的可利用價值，也因此，中國形象在十八世紀的歐洲被普遍否定，由烏托邦轉入意識形態。¹⁰

周寧的上述方法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引起學界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爭議。如王曉萍指出：

他不是從實質性的政治經濟關係出發來解釋原因，而是從觀點和心理上進行說明，這種觀點之間的演繹脫離了歷史經驗分析，而陷入了一種唯心主義論斷。¹¹

進入二十一世紀，卡門·許（Carmen Hsu）等海外學人基於十六和十七世紀西班牙的具體歷史經驗對門多薩的晚明想像進行了解讀。如她在〈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筆下的中國大帝國中的人文形象〉中指出，門多薩形塑了一個在司法機構、公共慈善機構和官員選拔任用上都具有制度優越性的他者之晚明社會，而這種理想化的晚明人文形象的產生恰恰折射出彼時彼地西班牙王國糟糕的政治生態環境和社會道德風尚。¹²相比起周寧的解讀，卡門·許的反思擺脫了心理層面的演繹，並以具體的歷史經驗為邏輯基點，對門多薩的晚明烏托邦想像進行了分析。然而，她的思考仍然局限在一種單向度的理論結構之中，忽視了中西雙方的交際性語境對門多薩之中國想像的建構性。

思考至此，我們得以洞悉，現下海內外學



圖3. 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畫像（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ortrait_of_Philip_II_of_Spain_by_Sofonisba_Anguissola_-_002b.jpg>。）

人解讀門多薩之晚明想像之局限性在於以下兩點。首先，我們普遍忽視了細讀原著善典，以直抵門多薩的他者想像世界並認知作者書寫立場的重要性。當下學人主要以中譯本、英譯本或現代西班牙語讀本《中華大帝國史》為研究底本。顯然，這就使得我們的思考建立在譯者和編者的文化濾鏡之上，這層隱形屏障很可能阻礙我們抵達作者的原初書寫立場。因此，本文以門多薩本人認可的原著善典——“1586馬德里西班牙語修訂本”《中華大帝國史》為研究底本，並通過文本細讀來重新定義門多薩在十六世紀歐洲視域下塑造的中國形象。其次，現下研究大多從單向度的批評視角出發，把他者的中國形象解讀為彼時彼地歐洲集體欲望或現實遭遇困境的一種無意識投射。然而，這種批評視域禁錮在了東西方的歷時性平行語境中，割裂了想像主體與客體之間切實存在的自

律性互動。儘管大明王朝被他者想像為繁花錦簇似的存在，甚至門多薩曾多次指出彼時的中國在諸多方面都是歐洲學習的楷模，但是這種他者的晚明烏托邦形象仍然沒有擺脫其處於主體想像中的失語和邊緣地位。倘若我們繼續沿襲門多薩採用的以西方為主體的單向度文化立場來解讀這部文獻，則很可能再度陷入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窠臼之中。

由此，我們觸及到的更深層問題是：在對歐洲形塑的中國形象進行解讀的過程中，漢語學人如何才能走出以西方為中心、東方為失語客體的單向度思維樊籠？事實上，這也是多年來一直困擾漢語學人的難題。作為回應，本文嘗試在全球史的視域及中西方的交際性語境中，對門多薩的中國形象進行重塑。這也是當下海內外學人在對這部讀本解讀過程中普遍忽視的一種研究視角。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十六世紀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期。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以及文藝復興等一系列歷史事件推動了全球化進程。然而，現下對門多薩之中國形象的社會生成機制進行的解構性批評，似乎並未關注到十六世紀的資本全球化初級進程對他者想像的建構性。因此，本文將以當下研究中的問題和留白為邏輯基點，在十六世紀的資本全球化初始進程、西方交互性歷時語境和全球史的視域下，重新解讀門多薩晚明想像的建構性。

二、他者的器物想像：富庶的東方大帝國

《中華大帝國史》於1585年以西班牙語書寫完成並在羅馬首次出版刊印，彼時的西班牙正是菲力浦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的統治後期，同時期的中國則處於大明萬曆年間（1573至1620年），這一時期被稱為“晚明”，這也是門多薩所想像的“中華大帝國”之原型。¹³ 因此，首先讓我們將目光放在《中華大帝國史》的西班牙語原著善典，並對其中塑造的晚明形象進行總納。

文獻研究

此前經筆者考辨，門多薩本人認可的《中華大帝國史》最終修訂本是“1586馬德里西班牙語修訂本”，¹⁴因此本文將以此本為研究底本。此本共有368頁，是32開小本。其序言部分依次是：教皇西斯托五世（Papa Sixto V）和國王頒發的特許證、錯誤校勘表、本書定價、“致國王陛下的御前會議大臣、西印度院院長，尊敬的費爾南多·德·維加·豐塞卡（Fernando de Vega y Fonseca）先生的獻詞”、兩篇致讀者獻詞及十四行詩。正文由兩部分組成，每部分又有三卷。第一部分是對明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文化、信仰、禮儀和習俗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對前人漢學家的中國見聞行記的轉述，這部分內容涵蓋了他者視域下從物質到精神世界、從庶民到官僚階層的晚明社會風貌。第三部分是歐洲漢學家的環球旅行見聞，具體記述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日本、菲律賓等亞洲國家以及在墨西哥的旅行見聞。其中，門多薩對中國的記述主要集中在前兩部分，共由91章組成。

筆者基於多年來對《中華大帝國史》原著善典的釋讀與研究發現，在讀本的91章關於中國的文獻報導中，¹⁵有23章述及晚明物質社會的富足，¹⁶有12章包含作者對晚明政治制度的讚賞，¹⁷由此塑造了他者視域下強大、富庶且擁有先進社會制度的異質文明形象。另外，文本中還有18章刻畫出了相對較為負面或批判性的中國形象，揭示了大明社會沒落的一面，主要體現在官員的貪婪狡詐和中國人精神世界空虛愚昧上。其他章節則進行了相對中性的知識型報導。整體而言，門多薩在十六世紀的歐洲視域下塑造了一個物質富足卻精神空虛的異質文明形象。需指出的是，鑑於篇幅所限，本文僅聚焦於門多薩的大明器物想像，他者想像中的大明精神世界將在後續系列論文中予以深入解讀。

在門多薩關於大明器物想像的23章之中，晚明社會被門多薩想像成了富足安逸的東方伊甸園。首先，他筆下的大明子民勤勞，土地肥沃，如其所述：

全國各地都人煙稠密，村莊一個緊挨着一個，與其說那裡有很多個村子，不如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超大型村莊。與其稱之為帝國，不如稱之為中國大都市。他們人口眾多，所以，全國都不剩下一塊荒地，又何況如前所述，這個國家也不允許閒漢無所事事。他們的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物價便宜。¹⁸

在門多薩的記述中，大明帝國富庶繁華，乃至街上難覓乞丐：

在大明帝國街上看到行乞是件稀罕事。如前所述，因為那裡沒有窮人，也不允許有，如果有，在街道上或廟宇裡也是找不到的。官員一旦了解到有人因為貧困無法謀生不得已行乞，他就會下命令從皇帝的財富中支付一份津貼給他們，並且數目很大，足以支付送他們來的士兵的費用以及其餘所有的花費。¹⁹

其次，大明帝國的市井生活琳琅滿目，商業發達：

達官貴人衣着華貴，他們的衣服是絲織的並且色彩絢麗，質地上乘，裁剪得當。普通百姓則穿一種粗糙的絲綢和麻布或棉布，當地盛產這種衣料。店鋪裡貨品琳琅滿目，各種檔次的衣料都有，既有金銀料子和紗料，也有麻布和粗布，品種多樣，顏色絢麗。藥房還出售草藥，價格也很便宜。這個國家的瓷器業發達，還遠銷葡萄牙、秘魯、新西班牙²⁰和馬來西亞等地……每個城市都是店鋪林立，店門口都掛有招牌，上面寫着出售的商品。這些商店一般出售絲麻毛混織品、金絲布料和各色絲織品。較低檔的商店則出售各色斜紋布、棉布、麻布和絨布。由於原料豐富，以及很多勞動力從事紡織業，這些商品的價格都很便宜。²¹

又如，門多薩在第2部分第1卷第16章中，對

泉州城的繁華市井生活有這樣一段描述：

我們走過的所有街道兩側都有棚子，下面就是商店，擺滿了各色商品，很貴也很新奇。他們建了很多牌坊，牌坊間距相同，這使得街道更加美觀，全國每條大街都如是，牌坊下面是很棒的市場，你可以在那裡買到想吃的任何東西，魚和肉、水果、蔬菜、糖果和蜜餞等，應有盡有，而且每樣都很便宜，幾乎花不了甚麼錢，便宜得就像白給一樣（todo a precios muy baratos que valen como de balde）。²² 他們的食物也很好吃，很豐盛……²³

門多薩還驚歎於中國人宴請習俗中的奢華排場：

一場宴會即便邀請來一百個客人，也是每人只在自己的那張桌子上吃。桌面佈置得極為華麗，金黃的桌面上繪有飛禽走獸、森林美景以及其他各種賞心悅目的風景。餐桌上不鋪桌布，桌前只放一塊垂地的花緞或絲綢。在桌角上放着用金銀絲點綴的小花籃，裡面擺放着鮮花和各種奇特的甜食，甜食做成了動物的形狀，如塗上金色的小象、小狗、小鹿和其他很多飛禽走獸。桌子中心用來集中擺放食物，這些食物放在器型奇特的磁片或銀盤中，儘管這些餐具日常很少用，一般都是總督才能享用。食物有美味多汁的禽類和烹調得當的魚類……²⁴

門多薩還屢次指出，神父們每次快要離開驛站前，中國官員早就準備好食物以備其路上之用，還不收他們一分錢。書中的第2部分第1卷第13章，記述西班牙人即將離開中左所港時，“一早就有人給他們備好充足的魚、肉、水果和美酒，以便叫人以他們喜歡的方法做飯。興泉道有令，不收神父一分錢”；²⁵ 又如，第2部分第1卷第20章也描述了西班牙人在福州參加完官方宴會後剛剛回到住所，馬上就收到了

總督送來的踐行禮——四塊綢料、一個文具箱和其他禮物，給奴僕的禮物是花毛毯；²⁶ 再如，第2部第1卷第22章也記述了西班牙人在福州受到熱情款待：

當地官員去拜訪他們，帶去了大量的點心、酒和水果，這是他們的拜訪禮節，食物是裝在奇特的小籃裡差僕人送過去的……總督也派人送來了極為豐盛的閩肉、雞、鵝、臘肉、點心糖果，其數量之多足夠一百個人當天美美晚餐一頓和第二天一整天的吃食。²⁷

最後，在門多薩的想像中，大明百姓的住房環境也頗為美觀舒適：

普通百姓的房屋都是羅馬式樣且修建精良。所有的屋外都栽有整齊的樹木，既美化了街道市容又提供了樹蔭給人們乘涼。房屋內部都粉刷得白如奶汁，光滑如紙。地板用又大又平的方石鋪成，天花板用的是一種優質的木料，不但結構良好還有彩繪，雕樑畫棟宛若錦緞一般，且木料呈金黃色，甚為美觀；每座房子都有庭院，裡面種滿了花草供主人休閒娛樂。沒有一戶人家沒有魚塘，儘管有的人家的魚塘很小……²⁸

此外，門多薩還對中國官員的官邸之奢華進行了特寫：

每個省府都有一個巡撫住在那裡。他們的官邸是由皇帝出資修建的。這些宅子簡直令人歎為觀止，建築工藝高超，外觀富麗堂皇。每個府邸的規模宛若一個村莊，府內建有花園、水塘、樹林和圍場，正如第四章所述，圍場裡還有各種飛禽走獸。²⁹

官舍房間十分寬敞，修建精良，裝飾考究，還配套有非常漂亮的院子和長廊，院裡的水塘養着各種魚。³⁰

文獻研究



圖4. 描述明代繁榮市井景觀的仇英《南都繁會圖》（局部），原件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南都繁會圖_01.jpg>.)

官舍十分寬敞和豪華，是磚石結構。廳室房間都不高，但客廳和臥室都很美觀舒適。³¹

鑑於篇幅所限，我們無法在此逐一列舉門多薩的晚明器物社會想像。基於對《中華大帝國史》原著的細讀，我們認識到作者在想像中塑造了一個百姓生活殷實安逸、物質生活富足的晚明器物社會。³²讓我們再回到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門多薩所親歷的彼時的中西方交際性語境是如何建構他者的晚明烏托邦想像的？

三、以澳門和月港為中心的外貿矩陣： 十六世紀資本全球化進程的歷史折射

要解答上述問題，我們需要對十六世紀的中西方交往予以近距離審視。十六世紀的顯著時代特徵之一，就是當時正處於資本全球化進程的初級階段。在那一歷史時期的海外貿易中，大明王朝除與鄰國進行傳統的朝貢貿易外，還參與到全球海上商貿之中。明代中國在大量出口絲織品、香料、稀有金屬、茶葉、瓷器等商品的同時，也少量進口海外土特產。大



明王朝擁有多個國際商貿港口，其中，澳門和福建月港（今海澄）是當時連接世界各地的海運中心，也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進行遠東貿易的重鎮。因此，我們不妨通過這兩座外貿重埔來認識大明王朝在十六世紀全球貿易秩序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在資本全球化初級階段中的角色擔當。

早在十六世紀初期，葡萄牙商隊就來到了廣州城外並請求通商，但遭到了大明王朝的嚴詞拒絕。《明實錄》載：

佛郎機國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並給勘合。廣東鎮撫等官以海南諸番無謂佛郎機者，況使者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以請。下禮部議處。得旨：令諭還國，其方物給與之。³³

此處的佛朗機國指的是葡萄牙，該指稱源於明代中國對“Frank”（法蘭克）音譯的誤讀。³⁴儘管明朝曾多次下令拒絕與佛郎機通商，但葡萄牙人卻並未放棄以各種手段打開中國商路，包括賄賂廣東地方官員，甚至試圖搶佔廣東的

文獻研究

屯門島，導致在廣州被捕入獄。然而，這也未能打消葡萄牙人對華通商的渴求。大約從 1557 年起，葡萄牙人終於在中國沿海地區尋得一處據點，即今日之澳門，並企圖長期駐紮下去。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在《葡萄牙海上帝國》（*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中對這段歷史也有所提及：

葡萄牙人在 1557 年在澳門取得了立腳地。大約 20 年後，住在北京的中國皇帝獲悉此地的存在後只得對此認可。³⁵

自此，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商貿基地和海運物流中轉站，逐漸控制了多條國際商線，如澳門—暹羅（今泰國）—馬六甲—果阿—里斯本；澳門—日本；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Acapulco，位於今墨西哥）—秘魯；澳門—東南亞；等等。³⁶ 我們不難發現，澳門儼然已成為了彼時重要的國際貿易中轉站。以其中一段果阿至澳門的航線為例，該航程途經馬六甲、暹羅、帝汶、錫蘭、緬甸等地區，船隊通常於當年的 4 月或 5 月滿載毛織品、衣料、印度花布、棉花和棉織品、水晶和玻璃器皿、時鐘、葡萄酒等物離開果阿；途經馬六甲時，商人們用船上的貨物交換香料、檀香、沉香以及暹羅的鯊魚皮和鹿皮等貨物，再出發駛向澳門；船隊一般在 6 至 8 月間抵達澳門，隨後又以澳門為基地，繼續前往廣州和日本進行貿易。³⁷

在門多薩所處的時代，葡萄牙人在亞洲的貿易網絡中舉足輕重。葡萄牙商人銷往日本長崎的貨物主要以中國的絲織品和生絲為主，同時也有來自歐洲和印度的藝術品、香料、葡萄酒和古玩等貨物。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貿易中，日本的白銀外流量很大。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開展對日貿易，從中賺取了大量白銀，然後又用日本的白銀購進中國貨物，並再度銷往果阿和歐洲。在這一過程中，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了中國。

再如，菲律賓在十六世紀淪為西班牙殖民地後，馬尼拉就成為了西班牙在亞洲的重要海

上貿易基地，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也十分頻繁。儘管這條航線較短，但貿易額較為可觀，且利潤率頗高。根據博克塞記載，每年從澳門運往馬尼拉的商品價值高達 150 萬西元，約合 100 萬兩白銀。³⁸

概之，澳門港一方面作為彼時重要的國際貿易基地，帶動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商業發展；另一方面又通過海上貿易連接起三大洋五大洲，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換，是資本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參與者以及世界市場形成的重要商業動驅力。當時的葡萄牙人在商路的每一個環節都通過差價賺取了高額利潤，但在此貿易鏈中獲利的不僅僅是葡商，隨着中國商品大量外銷，白銀也源源不斷地流入了中國。不容忽視的是，在上述的貿易過程中，流通的白銀不僅是作為支付手段的一個貨幣符號，而是已悄然演變成一種貨幣資本，這就是十六世紀資本全球化的雛形。

我們再來關注明清時期的另一條重要海上商線——馬尼拉大帆船航線（Manila galleon），這是一條由西班牙人掌控的商路。早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意大利人就控制了從地中海到亞洲的航道，而葡萄牙人則操控了從大西洋經非洲轉道亞洲的海上商路。面對大面積的被封鎖的出海口，西班牙人唯有開闢新航線才能擴展海外市場。1565 年，奧古斯丁修會修士烏達內塔（Andrés de Urdaneta）帶領聖佩德羅號（*San Pedro*）帆船，從菲律賓航行至阿卡普爾科港，開闢了連接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大陸的海上貿易航線，成功突破了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的商業封鎖。這條新航線從西班牙南部的安達盧西亞（Andalucía）港口出發，一路向西避開非洲和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繞道美洲，中途停靠阿卡普爾科港。他們以阿卡普爾科港為中轉站等待季風到來，然後乘大帆船前往菲律賓，並在那裡與來自中國的商船進行交易。

如前所述，菲律賓在十六世紀淪為西班牙海外殖民地後，成為西班牙人遠東貿易航線中



圖 5. 1628 年的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uerto_de_Acapulco_Boot_1628.png>。）

的重要樞紐。1564 年，西班牙殖民者黎牙實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及其探險隊發現了菲律賓並建立起西班牙在亞洲的第一個據點。至 1571 年，西班牙人又建成了馬尼拉城，並逐步推行殖民統治。因此，西班牙人在明清時期利用菲律賓的地理位置優勢與中國沿海城市頻繁進行貿易。當中國的商船來到馬尼拉，西班牙人利用從美洲獲取的白銀購買中國的暢銷商品，如瓷器、絲綢、棉布、稀有金屬、茶葉等，再把這些貨物運到美洲。每當來自馬

尼拉的載滿中國貨物的大帆船停靠在阿卡普爾科港，商人們就會舉辦大集，部分貨品很快會被當地人一搶而空，餘下的一部分貨品則會運往西班牙。由此，西班牙商船從美洲賺取的銀元作為貨幣資本又再次流入市場，並被用於採購中國的熱銷商品。這條航線就是“馬尼拉大帆船”航線。需指出的是，位於福建沿海的月港是明清時期“馬尼拉大帆船”航線中的重要一環，當地憑藉長期與菲律賓的私人貿易，迅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鎮，躡升為遠近聞名

文獻研究

的富埔。直至明代中期，月港之繁華已以“小蘇杭”著稱於世。³⁹自隆慶年間廢除海禁後，私人貿易的合法化更是加速了月港的商業發展，前往馬尼拉進行貿易的中國商人與日俱增，時謂“澄商引船百餘隻，貨物億萬計”。⁴⁰

我們僅從當時澳門和福建月港的海上貿易之繁榮，即可管窺明代海外貿易的興盛，以及對遠近諸國，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巨大商業吸引力。同時，這種貿易繁榮也折射了十六世紀資本全球化初始階段進程。明清時期像澳門和月港這樣的海上國際貿易重鎮，在廣東、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還有多處。通過這些出海口，中國的緊俏商品被販運到世界各地，中國也成為了全球貿易網上的一條重要供貨鏈，並且憑藉物美價廉贏得了海外市場。彼時的國際貿易又大多用白銀進行結算，因此，白銀源源不斷地從美洲、歐洲、日本和菲律賓等地流向中國，使得大明王朝長期在海外貿易中佔據順差優勢，這也是晚明時期國際貿易的顯著特點之一，⁴¹大明王朝亦成為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

四、門多薩的晚明烏托邦想像： 十六世紀經貿秩序和中西關係史的文學再現

中國經濟史學者全漢昇在〈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對“白銀帝國”對資本的吸納能力進行了估算，並指出在十六世紀的全球海外貿易中，“美洲白銀中的一半甚至更多都流入了中國”。⁴²此外，世界體系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德國知名學者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中也對明清海外貿易交往中的白銀流通資料進行了估算，並得出結論：“明代中國佔有全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並且這些白銀是貨幣形態的資本。”⁴³儘管這組估算難免存在出入，但卻再度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史實，即大明王朝在全球貿易中長期處於明顯順差地位。同時，這也就意味着歐洲對華貿易的逆差常態。

我們不妨再來細讀一份十六世紀的西文史

料，以進一步認識彼時的世界貿易秩序。這是一名葡萄牙人在1590年向菲力浦二世呈上的一份奏摺，當中的部分內容譯成中文為：

如果批准西印度與中國通航，則王國中的銀幣將全部流入中國而非西班牙；因為中國是如此之大，他們出售的貨物數額之多，以至於無論我們攜帶多少銀幣前往都會把他們全部吸納走。⁴⁴

顯然，這段史料揭示了歐洲人對於長期處於對華貿易逆差的焦慮，也從側面再次佐證了晚明在全球貿易秩序中的優勢甚至是資本掌控地位。這主要體現為在當時的國際貿易中，大量作為貨幣資本的白銀流入了中國。

至此，我們立足於宏觀歷史語境之中，特別是在十六世紀的資本全球化進程中重讀《中華大帝國史》，就得以更新對這部讀本的既有認知。門多薩通過誇張的想像把讀者引入了一個異質文化空間，並誇大晚明社會的美好，避諱其社會陰暗面。作者為讀者塑造了一個富庶和強大的晚明烏托邦形象的同時，也以文學的方式再現了他者想像中的原型——雄踞東方的“白銀帝國”。因此，在全球史的視域下，門多薩的晚明烏托邦想像實際上是十六世紀的世界經貿秩序的一種文學再現。與此同時，現下學人往往把門多薩筆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解讀為對彼時彼地西班牙所處的困境，以及渴望自我超越的一種隱喻性表達。⁴⁵顯然，這種知識立場忽視了中西方遭遇性語境對文本的建構性，以及在彼時的資本全球化進程中解讀門多薩的中國想像。

探討至此，本文對大明王朝與西葡等歐洲國家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交互關係進行了宏觀審視。我們不妨再遞進一層，對十六世紀末的大明王朝和西班牙王國的歷時性平行語境予以微觀審視。首先，讓我們的目光轉向彼時的西班牙國內局勢。儘管史學界普遍認為菲力浦二世治下的西班牙達到了古代社會的鼎盛時期，但到了《中華大帝國史》成書的十六世紀



圖 6. 科內利斯·克拉斯·范·維林根 (Cornelis Claesz van Wieringen) 繪《西班牙無敵艦隊駛離英國海岸》(The Spanish Armada off the English Coast)，約 1620 至 1625 年，荷蘭國家博物館藏。(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Rijksmuseum <hdl.handle.net/10934/RM0001.COLLECT.6554>.)

八十年代，彼時的西班牙處於菲力浦二世統治後期，西班牙已由盛轉衰。特別是 1588 年無敵艦隊慘敗於英國海軍，更是西班牙走向衰敗的標誌。事實上，門多薩在編著《中華大帝國史》時，西班牙已陷入了全面經濟危機，不僅發生了多次國家破產，債台高築，還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困難，境內各類商品也極為匱乏且物價高漲，急需向外採購商品進行補給。⁴⁶除了經濟危機外，西班牙的內政和外交也舉步維艱：對內，菲力浦二世嚴苛地鎮壓了西班牙境內的摩爾人叛亂，並以宗教法庭等方式壓制一切對天主教統治地位帶來威脅的異教勢力，造成社會動盪和政局不穩；⁴⁷對外，西班牙還與法國、英國、葡萄牙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陷入戰爭的旋渦。

與此同時，我們再把視域轉向同時期的中

國，彼時的大明王朝正處於“萬曆中興”時期（1572 至 1587 年間）。“興”指的是萬曆皇帝在位的前 15 年，得益於張居正改革等因素，國庫收入大增，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加之嚴厲整頓了吏治，社會呈現出階段性的欣欣向榮之象。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可否認“萬曆中興”下潛藏着多重社會危機。其時連綿不斷的對外征戰和對內平息叛亂引發了社會激蕩，正如樊樹志在《晚明史》中所述：

萬曆一朝最引人關注的大事，除了張居正和萬曆新政外，莫過於萬曆三大征，即平定寧夏哱拜叛亂，東正禦倭援朝，平定播州楊應龍叛。這三場重大軍事行動在西北、東北和西南幾乎同時展開。⁴⁸

儘管這些軍事行動最終取得了政績，但如此大

文獻研究

規模的戰爭不可避免地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損耗了大明王朝的綜合國力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動盪。此外，晚明的政治沒落和官場腐敗也已是眾人皆知的歷史。

即便“萬曆中興”背後潛藏着多重社會危機，但大明王朝通過海外貿易參與到了資本全球化進程之中，吸納了來自全世界的巨額貨幣資本並雄踞世界經貿秩序中的優勢地位，這也是不爭的史實。回望歐洲，同時期的西班牙不僅常年處於對華貿易逆差，還深陷於多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因此，基於十六世紀末期的中西方平行性和交互性歷時語境，本文提出了一個學理性判斷：門多薩在想像中塑造的富庶東方大帝國形象是對十六世紀中西關係史和世界經貿秩序的詩學再現。

結論

本文聚焦於門多薩在《中華大帝國史》中形塑的富庶強大的晚明形象，這也是該讀本中佔據主導類型的一種中國形象。現下學人對這種他者想像之中國形象的解讀大多局限於單向度的批評視域，並將這種晚明烏托邦形象解讀為彼時歐洲集體欲望和歷史困境的一種無意識投射。這種批評視域割裂了想像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自律性互動，也忽視了中西方交際性語境對文本的形塑性。

因此，本文以前人研究中的問題和留白為邏輯基點，選用了“1586 馬德里西班牙語修訂本”《中華大帝國史》為研究底本，在十六世紀的資本全球化進程和世界經貿秩序中，對門多薩筆下的他者的晚明器物想像進行了重新解讀。最終，本文得出了一種學理性判斷：《中華大帝國史》之所以能在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成為彼時彼地的知識分子認知中國的重要管道和書寫中國的範本，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是門多薩塑造的富庶強大晚明烏托邦形象承載了十六世紀中西方交際性語境的時代編碼。門多薩想像的原型是以“白銀帝國”著稱於史的大明萬曆王朝。“白銀帝國”這一指稱隱喻了

彼時的大明王朝在十六世紀世界經貿秩序中的優勢地位。從中西方遭遇性歷時語境對文本的建構性來解讀，門多薩的晚明烏托邦想像實際上是以誇張的方式再現了十六世紀全球化初始進程中的世界經貿秩序和中西關係史，這也是被當下海內外學人所普遍忽視的一種解釋立場。

附：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十六世紀歐洲視域下的《中華大帝國史》與中國形象研究”（19BWW012）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按：“1585 羅馬西班牙語首版”的版本資訊，參見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Vicencio Accolti, 1585. 此處及文中多處均沿用了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語書寫，其與現代西班牙語拼寫有異。
2. 按：經筆者考辨，《中華大帝國史》中譯本的翻譯底本是 1940 年北京英文影印本 *The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China*，該英文影印本的底本是英國漢學家喬治·湯瑪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編著的“1853 至 1854 年英譯本”《中華大帝國史》，此本又是從這部讀本的英文首譯本——“1588 倫敦英譯本”《中華大帝國史》再編而來的。“1588 倫敦英譯本”的參照底本是“1586 馬德里西班牙語修訂本”，這一本就是門多薩本人認可的最終西班牙語修訂本。此觀點參見高博：〈《中華大帝國史》英譯本、中譯本和西班牙語本考辨〉，《圖書館雜誌》，第 12 期（2020），頁 147–150。
3. 參見張鎧：〈十六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門多薩及其〈中華大帝國史〉〉，黃時鑑編：《東西交流論壇》第一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71。
4. 參見張鎧：〈十六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門多薩及其〈中華大帝國史〉〉，黃時鑑編：《東西交流論壇》第一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87。
5. Lach, Donald Frederick.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1. Book 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744.
6. Lach, Donald Frederick.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1.

- Book 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92.
7. Lach, Donald Frederick.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1. Book 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347.
8. 周寧：《天朝遙遠》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9. 周寧：〈跨文化形象學：思路、出路或末路〉，《東南學術》，第 1 期（2014），頁 83-90。
10. 周寧：《天朝遙遠》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46。
11. 王曉平：〈“以中國形象為方法”的方法論問題——評周寧跨文化研究系列論著〉，《文藝研究》，第 10 期（2012），頁 151-157。
12. Hsu, Carmen. "La imagen humanística del gran reino chino de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The 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 vol. 87, no. 2, 2010, p. 187.
13. 按：門多薩在《中華大帝國史》的西班牙語原著善典中稱大明王朝為“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直譯成中文是“偉大的中國王國”，這顯然是作者對明代政治制度的誤讀。也因此，現下中譯本廣泛採用了意譯的轉碼策略，把原文中的“偉大的中國王國”譯為“中華大帝國”，本文亦沿用了這種譯法。
14.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高博：〈《中華大帝國史》首版、善本和中譯本源流考述〉，《圖書館雜誌》，第 2 期（2019），頁 104。
15. 這 91 章指的是第 1 部分的三卷和第 2 部分的前兩卷。
16. 這 23 章分別是：第 1 部分第 1 卷的第 2、3、4、9、10 章，第 3 卷的第 3、4、18、22 章；第 2 部分第 1 卷的第 13、14、15、16、20、22、25 章，第 2 卷的第 6、7、12、13 章，以及第 3 卷第 15、17、20 章。
17. 這 12 章分別是：第 1 部分第 1 卷的第 9、10 章，第 2 卷的第 10 章，第 3 卷的第 1、10、11、13、14、20 章；第 2 部分第 1 卷第 24 章，第 2 卷第 7 章，以及第 3 卷第 18 章。
18.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238. 按：此處與本文他處的翻譯均為筆者自譯。需指出的是，筆者的自譯參考了《中華大帝國史》中譯本譯者何高濟先生和孫家堃先生的譯文，並對這兩部中譯本與“1586 馬德里西班牙語修訂本”之間的偏差進行了修補與重譯。兩部中譯本的版本資訊參見（西）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編著，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西）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編著，孫家堃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
19.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p. 234-235.
20. 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即今日之墨西哥。
21.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p. 17-20.
22. 鑑於西班牙語和漢語的不可通約性，此處筆者標註了門多薩的西班牙語原文所用的修辭。
23.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p. 162-163.
24.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94.
25.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152.
26.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173.
27.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176.
28.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14.

文獻研究

29.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14.
30.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152.
31. González de Mendoza, Juan.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Querino Gerardo, 1586, p. 158.
32. 按：此觀點見於筆者尚未出版的《十六世紀歐洲視域下的〈中華大帝國史〉與中國形象研究》，這部專著的文獻部分在語文學視域下，對門多薩塑造的他者之晚明器物世界和精神世界分別進行了詳細爬梳與總納。
33. 《明武宗實錄》卷 158，正德十三年正月壬寅。
34. 參見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頁 1。
35. Boxer, Charles Ralph.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Hutchinson of London, 1969, p. 63. 按：學界對葡萄牙人竊據澳門的時間一直存在爭議，1557 年是目前國際學界的主流觀點，後續研究有待對此時間進一步考證。
36. 陳炎：〈澳門港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90–195。
37. (英) 博克塞著，李慶譯：《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 (1550–1770)》，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15。
38. Boxer, Charles Ralph.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8, p. 135.
39. 乾隆《海澄縣志》卷十五〈風土〉，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 刊本，頁 2。
40. [明] 許浮遠：《敬和堂集》卷四〈疏通海禁疏〉，明萬曆二十二年 (1594 年) 序刊本，頁 20。
41. 按：此觀點見於樊樹志：《晚明史》上冊，上海：復旦大學，2016 年，頁 57。
42. 全漢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國經濟史論叢》第 1 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72 年，頁 445–446。
43. Frank,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25–130.
44. Blair, Emma Helen,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 7, BiblioLife, 2008, p. 134.
45. 此觀點參見筆者尚未出版的拙作《十六世紀歐洲視域下的〈中華大帝國史〉與中國形象研究》。在這部專著中，筆者對門多薩的西文參考文獻進行了詳細考據並得出結論，門多薩對前人漢學家的中國報導進行了誇大式改寫，由此塑造了他者視域下的晚明烏托邦形象。
46. Braudel, Fernand. *El mediterraneo y el mundo mediterraneo en la época de Filipe II*.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53, pp. 516–519.
47. Braudel, Fernand. *El mediterraneo y el mundo mediterraneo en la época de Filipe II*.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53, pp. 226–230.
48. 樊樹志：《晚明史》上冊，上海：復旦大學，2016 年，頁 385。



